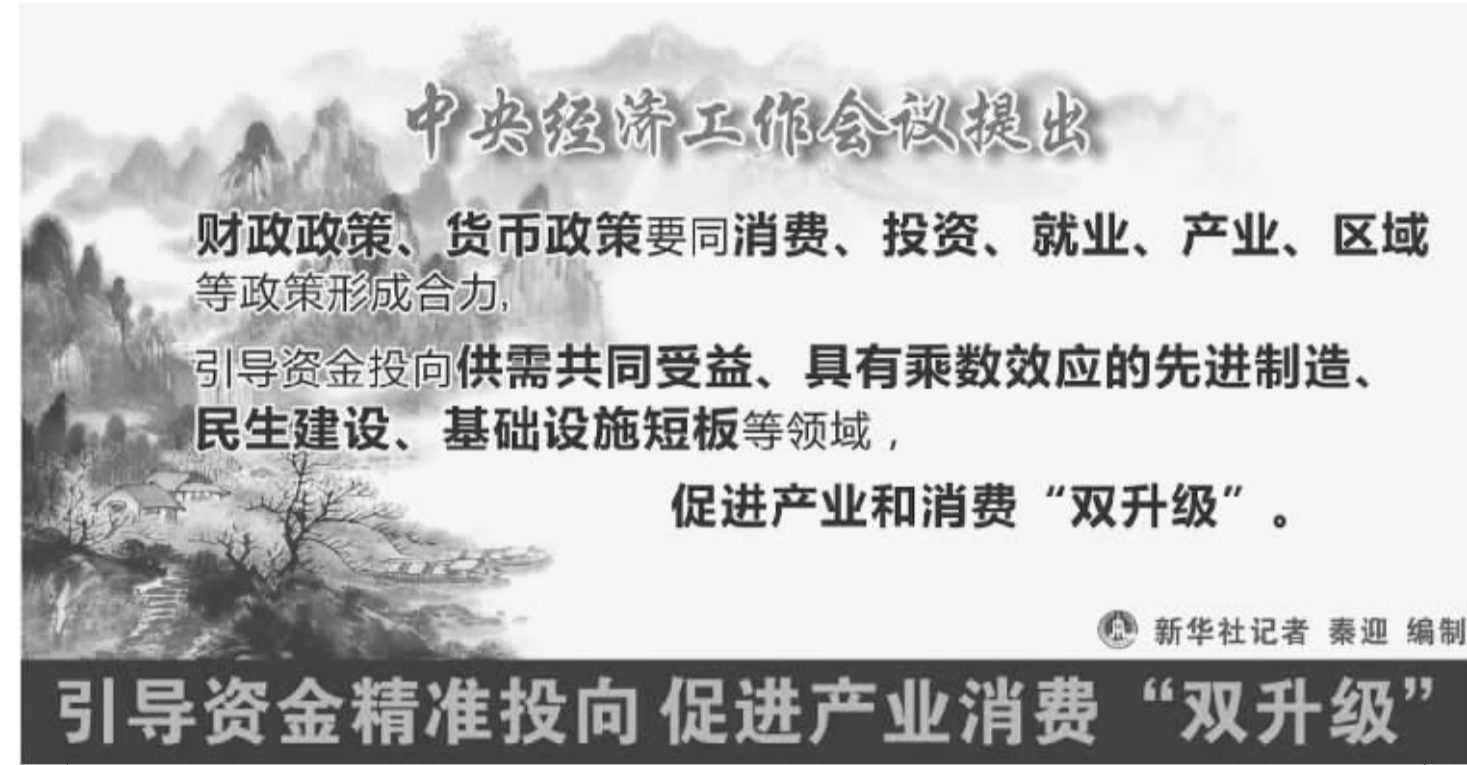


有利因素正在聚集 经济预期改善可期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张宸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0年经济工作,更加突出“稳字当头”。一方面,以“六稳”牵引宏观经济增长,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另一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整体看,既重视短期经济平稳运行,又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既关注需求侧稳定周期性增长,也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失衡问题。



经济增长发生结构性变化

会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

的新常态,标志着经济增长发生结构性变化。如何更好地实现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这是中国经济当前历史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新阶段,制造业大规模扩张式发展阶段行将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成本压力大又兼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凸出,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的约束持续强化,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中国迫切需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

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完善适合新业态发展的营商环境和金融基础设施,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应该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放缓的长期结构性原因与短期周期性影响因素,妥善安排长短政策组合,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振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同时,积极主动、适度有为地进行短周期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中长期稳定运行于5%-6%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是有条件、有基础实现的。

供给与需求侧双管齐下

需求侧两条不同思路出发,进行政策管理的过程。供给端主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理顺体制机制,激发经济要素内生增长的潜力;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应该认识到,经济中长期的增速换挡并不意味着经济小周期波动的消失。从短期看,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应通过需求管理,避免短期经济运行低于当前仍有条件实现的潜在增长水平,给深化改革腾挪空间和时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稳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市场预期注入了坚定信心。一是明确了短期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不能因为经济中存在结构性和长期性问题,就对短周期管理所

政策思路呈现新特点

期调节的主力工具。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加强调是重点突出战略性、网络型的必要建设。

第二,坚持“房住不炒”,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未来房地产政策重点将在全面落实因城施策,各地可以根据地方经济

深化改革开放

在进出口与扩大开放方面,2020年预计将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会议指出,要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引导多元化出口市场开拓;降低关税总水平;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近日,

中美贸易谈判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综合来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思路是多管齐下争取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方向是明确的。

深化改革方面,关键性改革无可回避。不难发现,市场改革、国企改革、产权与要素分配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改

坚持新发展理念

业升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产业基础能力、产业链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化与价值链高端化;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化与多样化;养老服务与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旅游业;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区域政策与空间布局,世界领先平台和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建设。上述主题都是

必要的稳增长政策有所忌讳。二是表明2020年经济总规模和居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仍要力争实现,打好“十三五”规划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收官战。

展望明年,我国物价实际水平预计将在2020年持续回落,呈现较今年更加温和的态势。事实上,我国今年以来核心通胀与工业品价格持续低迷,CPI数值的高位只是由于猪肉单一商品带来的供给冲击,随着当前生猪存栏的恢复,实际物价在当前时期总体难有高位运行的需求基础,2020年PPI仍然会处于低位运行态势,物价非但难以掣肘宏观政策,反而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提供了佐证。

运行与市场变化调整相关政策,这对于稳定预期,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对经济周期带来冲击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建立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长效机制应当着重从供给侧入手,真正实现该市场长期健康有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在城镇化后续进程与区域经济集中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合理住房需求。

2020年投资可以关注的方向。综合分析,有利于经济预期改善与风险偏好提振的有利因素正在累积,2020年经济运行与风险资产价格表现预计将得到正面支撑。明年应该是经济和权益市场的逐步修复之年。随着改革推进,长期结构性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增速换挡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有望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

疏解堵点

多举措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 黄国平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投资法规执法检查 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了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集中开展为期半年的“投资法规执法检查 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专项行动。旨在依照《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投资法规,依法提升投资治理能力,强化“稳投资”政策措施落地,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优化投资环境,增强投资信心,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有效应对当前投资运行下行压力,推动经济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投资环境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依然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民生、扩大就业、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托底作用。近年来,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把包括“稳投资”在内的“六稳”工作作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举措,指出我国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指出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化民生导向,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切实增加有效投资,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这为以“稳投资”作为“稳增长”抓手,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投资环境和投资效率还有待完善。

一是投资审批环节效率有待提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投资审批环节既存在诸如增加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前置要件等做法,也有诸如标准不统一、门槛不一和规则僵化等问题,甚至在审批环节中存在弄虚作假、强行收费和推介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是投资政策不衔接,政策执行不到位。目前,投资政策中存在着重规划、轻落实,重招商、轻衔接等问题。行业准入存在“玻璃门”和“隐性门槛”等潜规则,招商引资存在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不协调矛盾,以及投资项目落地与建设要求不衔接等弊端。

三是投资项目难落地,建设条件存“堵点”。近年来,有些地方投资项目发展规划与投资政策不衔接,重大项目推进机制不健全,项目建设会商协调机制薄弱,政府投资资金拨付不到位,前期论证不充分和脱离实际等问题导致投资项目落地困难,投资建设条件不足。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稳增长”关键在投资,提升投资重在调结构。当前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此,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对现行投资审批事项相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组织相关部门对省、市、县三级投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审查和清理,尽快确定国家和省两级投资审批事项清单。同时,严格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相关规定,加强政府投资管理,优化投资营商环境,出台省级配套制度,建立项目储备机制,规范项目决策程序,以促进投资质量提升和投资结构优化。

一是着眼于提升投资项目质量,增大优质投资项目储备力度。投资质量和投资项目储备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是否有力,这是“稳增长”和“稳投资”关键所在。要严格依照各项投资法规,

捕捉康波周期交替阶段投资机会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 郑磊

对经济周期颇有研究的原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周金涛,曾给出过一个预测:40岁以上的人,人生第一次机会在2008年,如果那时候买股票、房子,你的人生是很成功的。第二次机会在2019年,最后一次在2030年附近,能够抓住一次,你就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确切地说,我们目前处于第五个康波周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尾声,以及第六个康波周期的起步阶段,这个新旧交替阶段通常是无法准确区分的。由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及传统金融行业已经经过了景气顶点,目前距离第五个康波周期结束的时间不会超过5年。

在这个阶段,有些具有新周期动能的技术已经起步,比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等,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满怀希望,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目前看来,区块链可能是会发挥最大作用的技术,但仍需要至少5年时间,才能大范围在实体经济领域展开应用。而人工智能、大数据正处于高速增长长期,虽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发展的问题,但是经济效益已经出现。云计算服务已达到盈亏平衡点,将进入盈利期。其他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比如,量子高速计算、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都在蓬勃发展的之中。中国目前在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地位,要比上世纪末在互联网领域的位置更靠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

制定出台适应本地经济发展的投资计划,筹备筹划辐射性和带动性强的优质投资项目,推动项目储备不足的地区加快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合理扩大有效投资。例如,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把基础设施投资额、实施项目数调增的目标落实到具体项目和责任单位,并督促推进目标任务实现。同时,研究提出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拟部分列入“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前开工,提早形成投资量。

二是着眼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投资项目实施环境。深化投融资改革,优化投资营商环境,这是“稳投资”重要抓手。推进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和工程建设咨询改革,推动联合评审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一体化,强化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例如,可争取在近期部分重大和优质项目获批或取得实质性进展,完善重大项目协调服务机制,做好和督促解决重大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征地拆迁、施工干扰等问题,促进施工展开和投资量完成。提高投资项目审批效率,督导各地尽快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企业投资领域审批制度改革意见,出台相应配套管理办法和配套方案。进一步取消和下放部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激发企业投资活力。建立简政放权、系统互动、项目提速的工作机制,组织开展项目联合审批现场协调对接活动。

三是着眼于发挥财政性资金带动作用,激发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效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导向作用,持续鼓励和激发民间投资,这是“稳增长”和“稳投资”的当务之急。各级投资管理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整合优化财政预算内资金投向,改进资金安排方式和管理措施,促进稳投资、优结构。同时,以点带面,持续鼓励和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帮助解决民间投资项目融资困难,做好民间投资与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对接服务,支持各类股权投资企业探索拓展为重点项目筹资的渠道和办法,支持具备条件的各类项目和企业通过发债筹措建设资金。当前,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半数,这是“稳投资”“稳增长”和“调结构”重中之重。为此,可围绕放宽市场准入、拓宽投资领域、加大政策扶持、强化金融服务等方面细化完善配套政策。同时,优化投资环境,提供精准服务,破除不合理门槛,切实解决民间投资发展“最后一公里”问题,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

四是着眼于投资项目高质量发展,完善投资运行的评价考核。目前,有些地方依然存在片面追求投资规模的问题,对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提升质量效益缺乏足够重视,这种理念和做法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也是制定相应经济、投资和社会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要求。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稳投资”,并不是要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探索建立投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和真实地评估投资项目运行绩效,以及对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性效果,从而引导投资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上发挥更大作用,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做出科学判定,认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做好“稳投资”工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重要作用、提升长期综合竞争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加强精准调控,聚焦发展短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以高质量投资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世界经济现在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主要问题在于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足够大的缓解或解决。整体上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仍没有实质性改善。经过QE量化宽松之后,控制住了金融系统的混乱,但是并没有太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而是继续在金融市场内部流动,造成了股市和债市的泡沫。日本和欧盟基本处于长期失去增长动力的状态。

笔者认为,从2020年开始将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需要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快开放,另一方面在体制上更要注重解除束缚技术创新的因素。2020年经济重点会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尤其是配合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的基础建设。同时,有可能还会加快中国西部城市群的基础建设投资。

笔者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明年还是处在准备和孕育阶段,2050年可能达到高点,红利期将持续到21世纪末。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推动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这是一个与工业化时代差异很大的新型社会形态,投资者应该未雨绸缪,关注未来的重点投资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驱动性技术。在四个领域可能出现这种机会: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包括量子计算、5G和6G等),生物技术,新能源与新材料。